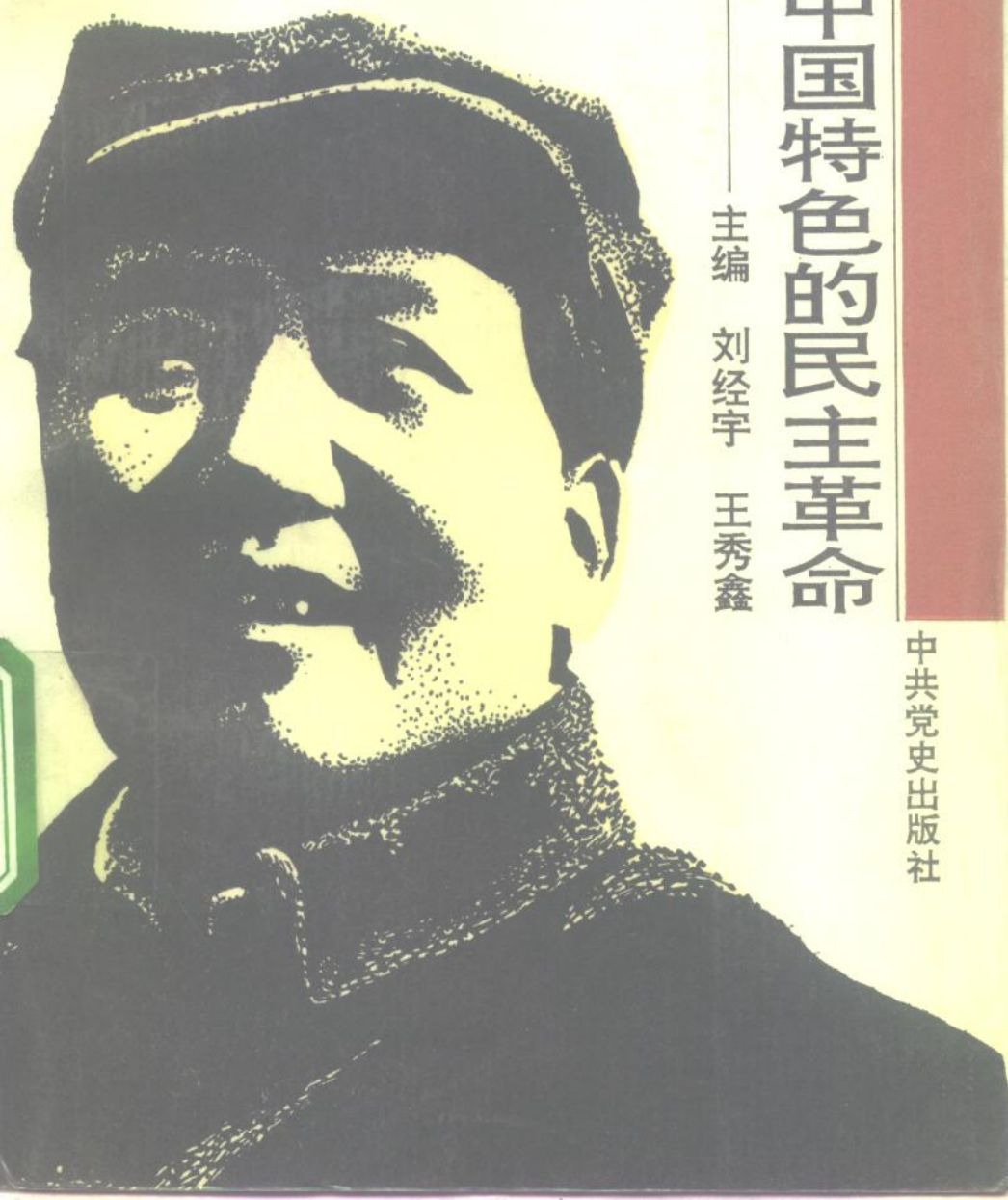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

主编 刘经宇 王秀鑫

中共党史出版社



A841.64

14

89410

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 民主革命

主编 刘经宇 王秀鑫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责任编辑:霍海丹

责任校对:邹祖兴

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

主编 刘经宇 王秀鑫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政编码:10009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宫门前甲 10 号

电话:(01)2581570 传真:(01)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环球科技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625 印张 270 千字

1993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ISBN 7-80023-681-1/K·634

定 价:8.60 元

编 者 的 话

今年12月26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值此有意义的日子来临之际,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毛泽东同志在缔造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丰功伟绩,努力学习他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概括的毛泽东同志的许多重要著作,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撰写、发表的。这些著作,我们必须经常学习。“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①根据这个精神,我们——主要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室的部分研究人员,围绕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这一主题,进一步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撰写了十三篇论文,作为毛泽东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对他的纪念(为了立论的完整性,个别文章也以一定的篇幅论及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运用和发展)。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经宇 王秀鑫

1993年5月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

目 录

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理论·····	沙健孙(1)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几个特点 ·····	刘经宇(39)
毛泽东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	王秀鑫(74)
论毛泽东对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 理论贡献·····	佟英明(109)
论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 ——兼评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的有关言论 ·····	郭德宏(142)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关于克敌制胜的一个根本思想 ·····	赵春昀(174)
得人者兴 失人者亡 ——学习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 ·····	叶心瑜(196)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王德京(217)
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 ·····	赵春昀(235)
略论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政权思想·····	李 蓉(259)
试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李 蓉(287)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王素莉(317)
毛泽东和中央苏区的建设·····	杨 青(345)

毛泽东与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理论

沙 健 孙

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如同毛泽东思想那样，起过如此巨大的动员群众、改造社会的革命作用。

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集体奋斗的基础上，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国情、总结中国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革命的环境十分复杂，革命的道路极其曲折，在这个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关于人民革命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是很自然的。这个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新发展。

（一）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处于剧烈变动中的社会，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度。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的斗争，其规模之宏大，群众动员之广泛，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革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伟大的斗争需要伟大的理论的指导。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民只面对两种可供选择的**思想武器**，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不得不打开自己的视野，把目光从本国转向外国，从东方转向西方，从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①为此，中国人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②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过于软弱，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向。这个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获得了全新的视野，推动他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新的东方，从西欧、北美转向革命的俄国，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在十月革命之前，虽然也曾有人在中国零星地介绍过马克思及其学说，介绍过其他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但当时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③。十月革命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这个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它证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14页。

③ 陈独秀：《答诸葆衡（社会主义）》，1917年1月1日。

明,“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①。考虑到“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认为,既然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加以仿效,即尝试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呢?它确实使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十月革命之所以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去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是这个革命发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在这个革命的基础上诞生的新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采取了新的平等的态度。这个号召,这种态度,对于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极其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第二,是在这个革命中,俄国的工人、农民、士兵进行了广泛的发动并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种依靠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进行革命的方法,与辛亥革命只依靠少数人孤军奋斗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照,成为推动中国先进分子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的因素。

自从1918年李大钊第一个在中国大地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后,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中国终于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思想潮流。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是以下几种人: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李大钊、陈独秀,五四运动中的左翼青年领袖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几位青年如李达、杨匏安,一部分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他们经过不同的途径,先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是热忱的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非屈从于任何压力,更不是追逐时髦。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绝不是偶然的。这是

①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1921年1月。

他们认真总结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各种学说和救国方案进行反复比较和缜密思考之后所作出的郑重的选择。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如下两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第一,当时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传统,而不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传统。

不应当忘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方面,它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本身就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的胜利和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破产。由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俄国人的介绍才学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所接受的一开始就是没有被修正主义者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这个社会中,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极度尖锐、紧张,反动统治是依靠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维持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不容易产生改良主义的幻想,不容易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盲目的崇拜。而且,在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武器的半殖民地中国工人阶级中,也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并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这个运动的创始人自来就对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比如,针对有人鼓吹中国“劳动者地位之增进与政权之转移,当取议会战略”这种主张,他们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①。这种主张,不过是“与虎谋皮”,而且将“为虎所噬”,实际上

^①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1921年1月。

则将“替虎噬人”^①。他们揭露，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由于受到第二国际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这就是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坚持了革命的方向的。

第二，中国的先进分子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从抽象的学理出发来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才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于他们，马克思主义不是需要加以崇拜的信条，而是用来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从来是把这个理论作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革命的科学，而不是作为凝固的、僵死的、万古不变的宗教教条看待的。他们强调，运用这个理论，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他所写的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文章中就指出：“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应当这样。“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尽管它是“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还是不可“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②。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他认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所以，李大钊主张把“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结合起来，告诫人们不要“偏于纸上

① 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

②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

的空谈”，而应“誓向实际方面去作”^①。这样，他就初步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遵循着这个方向，他还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有益的意见。

陈独秀也阐述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这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主张“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主张“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②，不要把它当作消遣品。可惜的是，他在实践中没有能够把这个正确原则贯彻到底。

在1922年初出版的《先驱》创刊号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提出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样一个任务。稍后，在1926年，蔡和森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要在自己的斗争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的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在这里，他已经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理论”这一任务清晰地提出来了。他并且认为，“党的革命理论是要经过长期间的各种斗争才能形成的”^③。

对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毛泽东作出了最深刻的论证。还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重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他说过，“吾人如果要想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

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

② 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1919年8月。

③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

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就自觉地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回忆说:“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到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工夫的”^②。认识农村如此,认识其他问题也是如此。正因为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才能在探索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作出创造性的贡献,才能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把握正确的方向。

20年代末、30年代初,针对中国共产党内流行的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在1930年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两个著名的论断。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更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应当“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正式提出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科学的

① 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1920年3月14日。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命题,并且指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把两者正确结合起来直接关联着的,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两者的“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这正是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在于它能够为解决革命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开辟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人民革命的理论和一整套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来;这个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掌握,就转化成了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

(二)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系统地、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欧洲。要把这个产生于欧洲的理论,应用于同欧洲多数国家不同的条件,即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农民,主要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正如列宁说过的那样,“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的解决方法,是“无法在哪一本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的,只有“根据自己的经验”才能解决这个任务^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革命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来说,这个任务的解决就显得尤其困难。在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由于对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105页。

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得不够，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是一个社会的矛盾很尖锐、革命的基础相当深厚的国家。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没有来得及作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就投入了实际的革命斗争。由于俄国革命在中国思想界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许多中国的革命者开始时有一种简单的想法，以为只要遵照俄国的榜样去做，中国的事情也就好办了。一个时期内，“布尔什维克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从组织上说，从1922年党的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有关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执行。这些，都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由于共产国际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而在国际中起核心作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又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共产国际曾经“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为指导制定自己的路线和策略方面，在实际工作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都得到过共产国际的帮助，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由一个远离各国的国际中心来具体指挥各国革命，这种作法本身是不可取的。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正如周恩来所讲，“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①。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前面讲过，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国党内盛行过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曾经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明白，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

开始就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正确的思想原则,但是要获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并据此系统地形成中国自己的革命理论即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们还是不能不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全新的奋斗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的目标;但党的一大所制定的纲领并没有指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即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出当前阶段的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这说明,党这时已经懂得了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的道理。但二大认为,这个革命的结果将是资产阶级获得政权,“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而已。这又说明,这时的党虽然划清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还没有划清新旧民主革命的界限。而到1925年1月召开四大时,党就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在决议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这个革命的参加者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这个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封建军阀政治和封建经济关系。这样,党就划清了两种民主革命的界限,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于这个思想的提出和阐明,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彻底性、这个阶级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进行了有力的论证,而且对农民和资产阶级作出了创造性的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大多数是贫农,他们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具有很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农也是可以革命的。这样,他就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同盟军问

题。他还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成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指出前者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后者对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这样,他就为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他还从对国际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指出当时的中国革命既不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同于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因此,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个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②。这样,他也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乃是一个新式的民主革命这个问题作出了初步的论证。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表明在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初步结合起来,表明毛泽东思想开始在中国萌芽了。

不过,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由于缺乏经验,没有深刻的革命认识,党未能提出彻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不懂得对资产阶级应当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不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和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这个口号是提出来了,但不能落到实处。其结果就是,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党犯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使这场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党的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新方针和“找着新的革命道路”的任务。党由此在政治上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但由于对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即这场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和它的长期性仍然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②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1月。

乏足够的认识，在一个时期内，党还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不是短时间的武装起义而应是长时期的革命战争，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进攻方向应是先取乡村而不是先占城市，并且先后三次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个时期，党中央没有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战争问题上，放在乡村工作方面，说明党还没有解决“找着新的革命道路”这个问题。

尽管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但由于他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所表现的政治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勇气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他成了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旗手。

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夜，毛泽东就曾提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或投到与党有联系的军队中去，“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即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在部署秋收起义的会议上，他强调“必须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指出“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①。上井冈山以后，他进一步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为此，他“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②。在党内，是他第一个阐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

在实践上，毛泽东首先把武装斗争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并且就小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作出了理论上的论证，从而对关系中国革命能否前进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出了答复。不过，在开始时，他也有过城市中心的思想，也曾主张以农村工作来配合城市工作。随后，当他看到城市起义先后遭到失败，而客观条件较充分并实行了正确的主观指导的农村斗争大都坚持了下来这个事实，他就逐步地树立了农村应成为党的工作重

① 转引自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报告》，1927年10月。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9页。